

學生閱讀資料的選用 ——以認識歷史學家為例

張 元*

學生上歷史課，應該知道歷史知識是建構出來的，從而理解這門知識的性質、結構和方法；目的是讓學生接觸知識中最為精要之處，進而有所認知，以培養其自學能力。問題在於著手的方法，中學課堂中實施歷史專業訓練，並不適合；設計閱讀資料，介紹歷史學家，加以導讀，或許可以一試。

歷史學家幾乎無不學識淵博，主要來自大量閱讀，而且從年紀不大時即已開始，這一類的資料，可以給青少年學生一些提醒或啟發。歷史是一門學問，如何「入門」，除了老師指引之外，學生更需要細心閱讀、思考，方能有所領悟。而歷史學是一門怎樣的學問，亦可讓學生閱讀關於考古學的介紹與研究的基本方法這類資料，約略得知，或初嘗滋味。

關鍵詞：閱讀資料、歷史學家、學生學習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門需要理解的知識，不是只靠記憶就能學得好。這樣的說法當然是對的，但是，「理解」又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說理解指的是學生需要知道過去重要事情的經過之外，還要知道事情造成的原因和產生的影響，那麼學生只要依藉記憶，仍然可以做到的話，似乎對於「理解」的「能力」並無實質幫助。如果，我們從「核心能力」入手，訓練學生對於「時序」、「證據」、「解釋」等等所謂「第二層次概念」的培養與掌握，當然可以達到讓學生理解歷史這門知識的目的，問題是，怎麼著手？中學的歷史課，就以高中來說，總不能把它上成像大學歷史系的「史學導論」或「史學方法」吧，假如一位老師這麼做，我們可以說，實在太超過了。

我們說學生上歷史課，知道歷史這門知識的性質、結構和方法，把它做為學習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我們實在無法否認歷史學有其獨特的性質、結構和方法，是一門頗具特色的學問；同時我們似乎也沒有理由認為學生學習一門課程，可以不知道這門課程的知識性質、結構和方法。我的理由是：首先，我們今天的歷史知識，都是建構出來的，學生學習它，不能只知道它的結論，而完全不知道建構的經過及其意義；其次，建構的過程最能呈現歷史知識的特性，其中的步驟，諸如問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蒐集資料、仔細辨別、選出證據、詳加論證、得出答案和予以表述等，都包含著這門學科可以提供的重要「能力」，學生若能熟悉並懂得運用，將受益無窮；第三，學生學習一門課程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培養其自學能力，以提升步出校門之後，進入社會之時，已具有「準備好了」的條件。對於中學生

來說，學習了一門新知識，也應該接觸到這門知識中最为精要之處，為下一階段的學習奠定基礎。

如果，我們都同意中學生的歷史課，已經不能只是記得一些「過去發生的重要事情」等現成的知識，而是應該對「過去」的「知識」有進一步的理解，問題仍是：如何著手？舉出某個問題，說明它的意義，介紹有關資料，講解論證過程，最後評價它的結論。這樣的歷史課，先不要說難度很高，大概不是一般教師能夠勝任，就從課程的目標來說，恐怕也有不能符合中學歷史課程之虞，因為學生學習歷史不是想進歷史系，做歷史家；把歷史的專業訓練用於中學歷史課程，怎麼說都是不適合的。再說，中學的歷史課程若能發揮教育的功效，學生喜歡上這樣的課，或說能夠吸引著學生，是教師必須考慮到的，過於專業，往往枯燥，成效也就大打折扣。¹

這樣說來，我們似乎遇到了到底該不該講知識結構的兩難了，好像陷入了不講不對，講也不妥的困境。這個困境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而且必須克服的。簡單說來，屬於應該講的，我們必須要講；但又不能講得太多、講得太深。講一點知識結構等，目的無非引導學生的思考，若還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就更理想了。設計閱讀資料，介紹歷史學者，或許是可以一試的辦法。

貳、青少年時代的環境與性向

歷史學家說：「在研究事實之前，先該研究歷史作家。」¹我們可以仿照著說：「在講述事實之前，先該講述歷史學家。」因

¹ E.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68），頁17。

為我們在課堂中所講述的過去事情，即所謂的「歷史事實」，並不是原先的那個樣子，而是歷史學家利用一些留下的「素材」，精心建構起來的。如果我們對於歷史家的工作一無了解，我們很可能會認為教科書上的記述，就是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所謂的「歷史事實」，幾乎同於過去的「真相」。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這個錯誤的認識，將會封閉進入歷史知識的門戶，永遠不會知道歷史是一門怎樣的學問。

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歷史學家，大概少有反對，若有，主要理由可能是時間不夠，課都講不完，沒法談課外的東西了。這是實情，我們必須加以考慮。考慮的方向有二：一是如何在講述「歷史事實」的內容裡或過程中，適度加入對歷史學家的介紹；二是利用課外的時間，提供資料讓學生閱讀。最好的做法，應是結合兩者，利用很少的課堂時間，開一個頭，加重語氣，強調這位歷史學家的重要，接著發下資料，要學生閱讀。至於有無時間討論，利用課堂上還是課外時間，就要看學生的反應與老師的熱忱了。我們很難想像班上大部分學生想要討論這些課外閱讀資料中的歷史學家，但相信總有幾位學生想多知道一點，老師若在課外加以指點與鼓勵，學生將會永遠記得。

從哪裡著手？我先想到的是歷史學家的青少年時代，我們從這裡介紹起。這類資料不多，但都很寶貴。讓學生看看傑出的歷史家，他們的青少年時代是怎樣度過的，他們的學識基礎是怎樣奠定的。我們當然不是要學生將來也專攻歷史，而是知道這門知識如何在學者心中逐漸萌芽滋長；我們希望學生所學的任何一門科目，老師都能談談傑出學者的青少年時代，都能由此帶領學生一窺這門知識的門徑。

中國史的開始是史前時代，我們就從這裡舉例說明吧。我首

先想到的是張光直，我們講新石器時代文化，總會提到的考古學家；今天我們腦海中的中國史前時代圖像，很大一部分是他建構起來的。再說，張光直出身台灣，曾任教於美國第一流大學，學術成就享譽國際。張光直學識淵博，為人謙和，與他接觸，都留下很好的印象，是一位為學與做人都讓人懷念的學者。

張光直在《考古學專題六講》的前言中，談到他的青少年時代。茲錄於下：

我是在北京生長的，並且在北京讀了小學和中學。我的祖籍是台灣，所以，在抗戰勝利以後，我就回到了台灣。不久，以前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台北，李濟、董作賓，以及其他考古學、人類學的前輩學者們在台灣大學成立了一個考古人類學系，我便報考了這個新系。

我所以報考考古人類學系，是由於早年所受的一些影響。我很小的時候，便熟讀過一本書，叫作《人類學泛論》，著者是日本的西村真次教授。我的父親張我軍先生是搞日本文學的，他把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1931年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印行。我不知道這本書在中國有沒有過任何的影響力，但是，因為我從小便守著這本書，對書裡的人類進化史、石器時代等等，很感興趣，它對我確實有過不淺的影響。1948年，我在台北坊間又買到一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書，叫《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是裴文中先生寫的。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本用中文寫的關於中國史前考古的書。裴文中先生在這本書裡把當時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資料與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的綜合。同時，在這書裡，裴先生又發了不少牢騷，說中國的考古可以說遍地是黃金，俯拾即是，但是有才華有志氣的讀書人卻很少有學

考古的。他說，希望在將來的中國有很多人走這條路，希望各大學有考古學系，並且希望成立一個中國考古學會。看了裴先生這本書以後，我對這門學問更加嚮往。

1954年，我從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不久，我又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讀研究生。畢業之後，先在耶魯大學，後來又回到哈佛大學，從事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從1951年開始，我就參加了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台灣的田野考古以外，還參加過北美和法國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²

我們在這一段資料中可以看到兩個重點，一是人的「性向」很重要，青少年時期最感興趣的事物，往往就是成年之後做得最好的事情。二是「閱讀」的重要，少年時期，讀了一些感到興趣的書籍，受到它的影響，就會朝這個方向發展。所以，青少年學生不能只讀教科書，只應付學校裡的考試，只想得到高分。要利用時間，讀一些有價值的好書，擴大自己的知識面，才能發現自己的性向所在。至於讀什麼書，就需要向老師請教了。

這段資料很簡單，國中學生也可以一讀。學生知道一些書名，如《人類學泛論》、《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儘管談不上是經典名著，卻可以透過書名，知道一個學問的領域。也許知道一些人名較為重要，如裴文中，這位親手發掘「北京人」的學者；李濟，被尊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學者，以及董作賓，研究甲骨文與殷商曆法成就卓著的學者。學生，特別是國中學生，不需要知道太多太細，當他們進入高中，再度遇見裴文中、李濟、董作賓的名字，不是首次見到，就會多一點親切的感覺。

²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

上古歷史的知識，除了依藉考古學，就是神話與傳說。今天，我們不會再講三皇五帝、堯舜禪讓、大禹治水、少康中興之類的題材，應與歷史學的「現代化」有關。民國初年，從傳統的觀念中走出來，考辨資料的可信與否，猛烈批評陳舊的歷史記載，進而建立系統的論述，開啟了現代史學的發展方向，無疑是顧頡剛與他發起的「古史辨運動」的意義所在。³那麼，這位顧頡剛先生的青少年時代，有無留下可以讓我們一讀的資料？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就是一篇六萬餘言，談論學術的自傳體大文章，自然寫到他在中學時期讀書的情景，也錄於下：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鈎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其次是經學（直到後來纔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是史學），我購買的書籍就向那兩個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只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就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裡

³ 余英時說：「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盪，主要因為它第一次有系統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所以，此說一出，無論當時史觀如何不同的人都無法不承認它在史學上所佔據的中心位置。……他辨偽儘有辨之太過者，立說也儘有不可盡信者，但今天回顧他一生的業績，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最先奠基人之一。」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274、279。

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著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只能向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看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櫃們討教版本上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然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冊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成一冊自述，題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第二篇是〈恨不能遊盡天下名山大川〉，第三篇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我的肚子。我的癡心妄想，以為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須把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樣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鷄一樣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只為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為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為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於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部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也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為這是讀書時尋題

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找材料，而不是死讀書。不過那時只是隨著欣賞的趣味而活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麼成績。⁴

我們讀這篇資料，首先看到的是顧頡剛成長的環境，蘇州的書香家庭，薰陶感染之餘，幼小的心靈很容易走向學術文化的道路。不過，他也說及不喜歡語言文字之學，表示他在眾多的發展選項之中，捨棄了最為有利的小學，也未在文學和經學方面繼續鑽研，而是選擇了史學，多少也與他的性向有關。不過，在這兩段資料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不妨問問學生。學生很快就會說：「閱讀」。對的。中學時代每天下了課就跑書店，進而研究目錄學，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其目的也是為了閱讀。但一本書沒讀完，就讀第二本書，從未讀完整本書，儘管不是很好的讀書習慣，他卻說不無益處，也值得注意。因之，「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死讀書。」就是一句很有啟發的話了。

學生看了這段資料，應該不會有起而仿效之心，或許會覺得顧頡剛真是一個奇怪的古人，請他們說說讀後的感覺。如果學生感到顧頡剛的時代離我們已經太遠，老師正可以帶領學生去想像一下，一百年前的中學生（顧頡剛生於 1893 年），他們生活在怎樣的社會情景和文化氛圍之中，與我們真是有著很大的差距。一百年尚且如此，五百年、一千年的今古差別就更為巨大了，我們想要有所了解就更為不易了。

⁴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台北：明倫出版社影印，1970），頁 15-16。拙著《談歷史 話教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 76-80。亦略有談及，可參看。

參、如何進入學問之門

青少年時代，由於環境的薰陶，性情的取向以及閱讀的習慣，每每為學者的養成打下良好基礎，不過，它也只是在漫長路程的最初階段上佔有若干優勢而已。學有專精首需進入學問之門，這固然需要老師的引導，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領悟。歷史是一門思辨的學問，熟讀二十五史，講起過去的事情，滔滔不絕，若無辨析的能力，也只是在歷史門外徘徊而已。顧頡剛說：「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書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不過是「癡心妄想」，就是這個道理。

歷史學家如何進入這個知識之門的，我們不妨選兩段他們的自述來讀讀。余英時稱顧頡剛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最先奠基人之一」，但也指出他「辨偽有辨之太過者，立說有不可盡信者」。時至今日，顧頡剛提出的系統論述，也就是著名的「層累地造成古史說」，已經不再有人提及，更不會在課堂上講給學生聽了，主要原因正如徐旭生（炳昶）所說：「所用的治學方法很有問題」。⁵徐旭生不只是批判了顧頡剛的學說，他自己也提出了系統的論述，就是所謂的「我國古代部族三集團說」。⁶他的說

⁵ 徐旭生說：「（疑古學派）他們工作的勤奮是很可敬的，成績也是很大的，但他們所用的治學方法很有問題。主要的，去世的張蔭麟先生已經指出，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敘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對這一方法，法國史家色諾波說得不錯：『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故于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 19 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極端疑古學派的工作人對於載籍湮滅極多的時代，卻是廣泛地使用默證，結果如何，可以預料。」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26-27。

⁶ 徐旭生，〈我國古代部族三集團考〉，《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

法，已經為中學的歷史教科書普遍採用。⁷

徐旭生是怎樣走上歷史之途，進入學問之門的？他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初版（中國文化服務社，民國 33 年）的「敘言」中，作了簡要的陳述，茲錄於下：

我個人自從很幼年的時候，就對於歷史上的事實發生很濃厚的興趣。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十一二歲時就抱著兩部首尾不很完全的通鑑綱目和續綱目，廢寢忘食地閱讀，就覺得非常地可笑。但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我對於歷史的興趣，發生得相當地早。此後遇著歷史一類的書總是很高興地閱讀。當十五六歲的時候，積的知識也頗有一些，就亂七八糟的胡發議論。這時候，正當前清光緒庚子辛丑以後，國家取士初變八股為策論，我因為對於史事略有所知，雖說年幼信筆塗抹，卻也尚不後人；自己已經頗滿足，以為很了不起了。不久因為預備科舉，就偶然買到坊間印行的王船山讀通鑑論及宋論。開始閱讀的時候，僅感覺到他篇篇的議論全同我原有的意見不相同。起初不過以為他老先生好作翻案文章而已。及至常看並加思想以後，才知道他並不是好作翻案，他的思想比我們尋常人的思想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42-147。

⁷ 例如，拙撰高中《歷史（上）》（台北：龍騰文化公司）中有一段課文：「歷史學家說，遠古時代氏族的名字與個人的名字往往相混，很難分辨，特別是一位傑出的領袖，能力很強，聲名烜赫，死了以後，他的名字就成為氏族的名字，黃帝就是一個例子。以黃帝為代表的華夏族向東方發展，遇到以蚩尤為首領的東夷族，難免大戰一場，就是傳說中的涿鹿之戰。戰爭之後，兩大族由於接觸頻繁而逐漸融合，許許多多的小氏族也合併成為若干大部族，這時出現的顓頊，是一位卓越的領袖，他制定教人按時耕種的曆法，反映農業文化有了重大的進展。」（頁 7）就是依照徐旭生的觀點而寫的。

實在深遠的多；我們想再翻他的案也非常地不容易。這才開始感覺到對於古人非在讀破萬卷並加深思以後，實在不應該粗心浮氣，亂發議論！民國成立以後，我又到法國留學。當民國四年，我才讀到法儒 Langlois 和 Seignobos 合著的史業導言（*Introduction al'etude historique*）及其他歷史方法論的書，才曉得對於史料必須要用種種的方法，慎重批評和處理才可以達到科學的歷史（*L'histoire scientifique*）的目的。在此以前，我覺得我對於歷史的事實知道的頗多；自此以後，我才感到毫無所知！因為這些全未經批評的史實，尚未足以言歷史知識也。我今日對於各家的歷史，歷史方法及歷史思想的著作雖然也讀過一些，但是對於我個人影響之大，再沒有超過於讀通鑑論，宋論，史業導言以上者，所以在這裡附帶著說一說。⁸

讀這一段文字，最主要的問題是：徐旭生是怎樣進入歷史之門的？讀了很多很多的歷史書，積累了不少的具體知識內容，就像今天每次考試都得高分，自以為很不錯了，其實並沒有進入，甚至可說還沒有見到呢。依據這許許多多的史實，隨意發表議論，好像很有思考的能力，非但經常得到老師們的稱贊，自己心中也不免得意，以為很了不起了，以為歷史不過就是如此，說明他還是沒進入歷史之門。直到讀了真正有深度的書，並且仔細想過之後，了解古代大學者的淵博與精深，這時才算是走到了門口，可以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了。徐旭生把這三個讀書的階段講得非常清楚。民國初年，他到了法國，讀了兩位法國史家的

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的「序」中，已未見此段文字。拙著《談歷史 話教學》曾加以引錄，參見頁 91-93。

著作，真正知道了歷史是一種怎樣的知識，才算是進入這個園地，等待機會到來，即可一展身手。

學生讀了之後，我們不妨問問學生，看看他們能否掌握資料中的要點。徐旭生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讀通鑑論》、《宋論》和《史業導言》，資料中哪兩句話說明了他所受到的影響。這是第一個問題。接著問：你們可以看出，王夫之（船山）的書和兩位法國史家的書，性質上有所不同嗎？請指出來。第三個問題則是：哪一句話說出了徐旭生的讀書方法？我們期望學生的答案是：一、「他（王船山）的思想比我們尋常人的思想實在深遠得多」，以及「才曉得對於史料必須要用種種方法，慎重批評處理才可以達到科學的歷史的目的」。二、王船山的書，其中有很深的議論；兩位法國史家的書，偏重於史料的考訂。三、「常看並加以深思」這一句話。

徐旭生說受到王船山《讀論鑑論》很大的影響，不是一句平常的話語，其中應有極大的功夫，也就是他對這部書的熟讀深思，故能明其思辨，知其精義，悟其深心。⁹當今學者之中，在哲

⁹ 錢穆記有與徐旭生的一段交往：「（抗戰期間）教育部為避空襲，遷青木關。此次開會，討論有關歷史教學問題。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來預會。旭生曾從法國漢學家赫文斯定考察新疆後，為中法研究所所長。余在北平屢與謀面，但未深交。會既畢，余因出席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仍留青木關。旭生方讀余國史大綱，欲相討論，亦不離去，遷來與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課，旭生留室中讀余史綱。午後，因夏日西曬，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離室去至郊外，擇村間一茶座，坐樹蔭下對談，至晚方歸。如是以為常。余在講習會有課一星期，余與旭生作半日討論者，亦一星期。旭生讀余書既完，討論亦粗完。一日，旭生忽背誦王船山讀通鑑論一段，首尾逾百字。余大驚訝，曰，比來，君未攜一書，何從借閱。又背誦如滾瓜之爛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國留學前，幼年熟誦，今追憶及之耳。旭生年長於余，早年留學。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於數十年前所讀書，猶能隨口背誦。今日一大學生，能繙閱及此等書，已

學方面極有成就的熊十力，¹⁰對王船山的《讀通鑑論》也是十分重視。歷史學家徐復觀¹¹有一文，談到如何進入學問之門，就是受到熊十力的啟發，其中提及王船山的《讀通鑑論》。這一段資料，很多人讀了都覺得很生動，也很感動。不知道高中學生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如果經由老師的說明，不知能否讓他們對於如何進入學問之門，也會有所感受。茲錄於下：

我決心扣學問之門的勇氣，是啟發自熊十力先生。對中國文化，從二十年前的厭棄心理中轉變過來，因而多有一點認識，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啟示。第一次我穿軍服到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看他時，請教應該讀什麼書。他老先生教我讀王船山的讀通鑑論；我說那早年已經讀過了；他以不高興的神氣說，「你並沒有讀懂，應當再讀。」過了些時候再去見他，說讀通鑑論已經讀完了。他問：「有點什麼心得？」於是我接二連三的說出我的許多不同意的地方。他

是一大異事。則無怪乎吾輩兩人，此番所討論，已成為學生難遇之奇緣矣。」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212-213。

¹⁰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人，父親為鄉村塾師，少年時為人牧牛，但勤奮自學，喜讀王夫之、顧炎武著作。曾參加辛亥革命，目睹革命黨人爭權奪利，憤然返家，致力學問。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先生修習佛學，撰成《唯識學概要》。1922年經梁漱溟介紹，至北京大學講授佛學。1932年，發表《新唯識論》，由佛轉儒，形成哲學體系。熊先生學問精深，著作宏富，公認為近代中國少數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所撰《讀經示要》與《十力語要》，可視為了解其學術思想的入門之書。

¹¹ 徐復觀曾就讀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抗日戰爭期間，頗受蔣委員長賞識。國府遷台不久，徐先生棄武從文，發表了幾篇擲地有聲的學術論文，遂得以轉往大學任教，先在台中農學院、東海大學，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徐先生勤於著述，且以洞察敏銳，見解透闢，享譽學界。他的眾多著作之中，《兩漢思想史》最為著名。

老先生未聽完便怒聲斥罵說：「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譬如讀通鑑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這一罵，罵得我這個陸軍少將目瞪口呆。腦筋裡亂轉著；原來這位先生罵人罵得這樣兇！原來他讀書讀得這樣熟！原來讀書是要先讀出每一部書的意義！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近年來，我每遇見覺得沒有什麼書值得去讀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聰明耽誤一生的人。以後同熊先生在一起，每談到某一文化問題時，他老先生聽了我的意見以後，總是帶勸帶罵的說，「你這東西，這種浮薄的看法，難道說我不曾想到？但是……這如何說得通呢？再進一層，又可以這樣的想，……但這也說不通。經過幾個層次的分析後，所以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受到他老先生不斷的錘鍊，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也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慢慢感到精神上總要追求一個什麼。為了要追求一個什麼而打開書本子，這和漫無目標的讀書，在效果上便完全是兩樣。¹²

¹²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發表於《文星》四卷六期（1959），收錄於《徐

我們怎麼講這段資料呢？當然先要掌握要點。實施的方法，或許可以先讓學生讀一下，再把要點稍作說明，問問學生看出來了嗎？個人意見以為「要點」如下：

這段文字之中，「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顯然是最重要的一句話。何以是「起死回生」呢？因為如果不經熊十力老先生的「指點」，就是這凶狠的「一罵」，還是依照原來的的方法讀書，非但做不成學問，甚至不會有什麼長進。為什麼？因為只挑書中不好的地方加以批評，表面上看，好像用了腦筋，好像懂得批判思考，其實看不出書中的精義，只是一味的挑剔，怎麼可能得到讀書的好處呢？更糟糕的是，剛剛開始讀書、求學，卻養成自以為是的壞習慣，對於個人的品德也會有不好的影響。

徐復觀感到「起死回生」，並不只是讀書「先看出他好的地方」而已，更重要的勿寧是下面的一句話：「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這是他自己儘管讀過卻全然未曾領會的地方，聽到熊老先生的分析，真是如同「發聾啟聵」一般，宛如掃清了籠罩在「書」上的迷霧，看到了「書」的真面目，知道了「書」的價值，也就是「原來要先讀出每一部書的意義」。我們可以說，熊十力老先生的這一番話，其實就是指出了讀書的「路徑」，告訴我們讀書的時候，惟有了解「這一段多麼有意義，那一段理解如何深刻」，才是走上了「讀書」的道路。我們也可以說，「讀書」的道路，也就是「思考」的道路，思考的對象，無非就是古人高遠的理想與精細的分析。

這段文字的最後一段，也很重要。徐復觀與熊老先生談及文化問題的那一番描述，我們讀來覺得生動之餘，應該對於熊老先

生的最後一句話留下印象。「經過幾層次的分析後，所以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句話告訴我們，討論問題，必須仔細思考，反覆探究，找出它的層次，理清它的邏輯，才能下一個不易為人推翻的結論。這樣的努力，固然十分辛苦，但終能擺脫了浮淺，而且把自己的境界提升起來，才會逐漸知道「打開書本」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段資料告訴我們，要進入學問之門，讀書之外，不可以沒有思考。我們不是說：歷史是一門重視思考的學問嗎？如果一個學生，沒有思考的概念，只是一味地背誦；輕忽思考的方法，以為只要提出批判的意見；不知前人的思辨功力，不知應該向前人學習；他非但無法進入學問之門，而且連這是一門怎樣的學問都難以知悉，像是站在一堵高牆之外。我們當然知道，學生未來的發展多樣多元，完全可以不進入學問之門，不做學術研究，但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對於所學的知識，理解它的主要性質和初步方法，總是應有的素養。這樣的素養，該在什麼時期培育呢？還是在學期間最為適宜，理論上，高中應是關鍵時刻。

肆、歷史工作的基本概念

我們好像還未談到「歷史學家」的「工作」，這部分是不可或缺的，雖然不難找到關於歷史學家工作的資料供學生閱讀，這裡還是應該選取兩篇，略作討論。我想就上文談到的學者中，選取兩段資料，看看他們在實際工作上的意見。

第一位，我選張光直，他雖然專攻考古，但也是廣義的歷史學家，在他的觀念裡，考古和歷史是不能分開的。我選他談「什麼是考古學」，這是一段較長的資料，卻是既重要，又實用的資

料。試想，我們講遠古歷史的時候，能夠不談「考古」嗎？我們既不能不談，也不能隨便說考古就是去挖一些古人留下的東西，像石器、陶器之類；因為講得簡單，學生過去已知道了，新課程未能增添新知識，終屬憾事。再說，「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知識，這才是這節課學習的重點所在，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仔細介紹，那麼，給學生一篇資料，略作解說，要他們回去閱讀，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法。

我想談談什麼是考古學。

我們從事考古工作，第一件事情，自然就要明白考古學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學問，它的性質和作用是什麼。不過，對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但是，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相似的，那麼我們所使用的概念也應是相似的。

就我個人的認識而言，一方面，我的理論傾向是三十年來在美國考古學界生存所培養出來的；另一方面，我的考古學實踐是在中國文化範圍內進行的，當然又受到中國考古學傳統的許多影響。由於我的這種特殊經歷，我希望，我的一些心得一方面可能有它新穎的成份，一方面也與各位的想法是很易於溝通的。

什麼是考古學？我想我們不必在字面上下功夫，不必嘗試給考古學下一個盡善盡美的定義。我們只需了解考古這個學科的實質和特點，從而明確我們工作的方向就夠了。

「考古」這個名詞在中國語匯中很早就出現了，比如北宋時的呂大臨就曾作《考古圖》（1092）。但那時的考古，僅限於對古代傳世器物的搜集和整理，與近代考古學還不是一回事情。近代考古學這三個字可能是經過日本人翻譯

西文 Archaeology 而來的。Archaeology 這個字是由希臘字的「古代」和「學」而來的。說 Archaeology 是研究古代之學固然是準確的，又未免過於廣泛了。

現代的考古學基本上是實地研究與實地發掘地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的學科。這門學科一方面是發掘新材料，一方面又是研究新、舊材料的。考古學是什麼，看起來最要緊的要看它所發掘和研究的是什麼樣的材料。是不是發掘什麼樣的材料，研究什麼樣的材料的都是考古學？恐怕也不盡然。我們到田野裡去調查發掘，會得到什麼樣的材料呢？

第一、最明顯的對象是古代人工製品的遺存。比如石器、陶器、金屬器等各種遺物，以及墓葬、基址、窖穴等各種遺跡。這些都是自然界所沒有的、經過人手製造的，當然是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對象。

第二、比較次明顯的，是古代工業製造過程中的廢棄品。比如製造石器時打下來的石屑、小石片，做骨器時剩下來的骨料等。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明顯的實用價值或美術意義，但在復原古代工業技術過程時，是不可缺少的資料。

第三、在古代遺址的垃圾堆裡可以找到許多動物骨骼、牙齒和植物的莖桿、籽實。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遺存中，動植物種類的不同，反映出食物種類的不同。因此，這類材料對研究古代飲食內容和方式有不可缺少的意義。同時，它在古代自然環境的復原工作上也是很重要的。研究這類材料時，我們需要動物學、植物學、古動物學、古植物學的訓練，或者這些方面專家的合作。

第四、是古代遺存中的許多物質通過實驗室研究所提供的資料。比如通過對古代土壤中花粉的分析，可以知道當時

的生態環境；通過碳十四和熱釋光的分析，可以知道古代遺存的大致年代；通過對燒鎔方式和礦物成份的分析，可以了解古代生產力的水平以及金屬原料的產地等等。要得到這些資料，需要物理、化學等各種自然科學的技術。

第五、是古代遺存中的文字資料，比如甲骨文、金文、盟書、竹木簡、帛書等等。要了解和掌握這些文字資料，需要在古文字和古文獻方面有相當的訓練。例如馬王堆的周易是考古學的產品，但是哪個考古工作者能夠把它和傳世的《周易》分開來研究呢？

上面開列的只是一張大致的清單，但是從這張單子上已可以看出，考古學所處理的材料是複雜的，而且是多面的，所需要的學習、訓練也是複雜的多面的。那麼，上述這些材料，有哪些屬於考古這門學科的範圍呢？哪些不屬於考古這門學科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有一套有系統、有秩序、合邏輯的答案，而不能根據自己的工作面或者歷來的習慣作出回答。說「我們一向如此」，不能算是合理的回答。

從這個觀點看來，考古有廣義的有狹義的，有有史時代的，有史前時代的。這兩分法是比較有道理的，但並不是百分之百清楚的。

廣義的考古學，指對考古調查、發掘所產生的一切遺物、遺跡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對動植物、礦物等各種資料的分析研究。

狹義的考古學，指專對人工產品或文化遺物的分析和研究。對那些非人工遺物的研究，我們可以根據研究的對象，以及所使用的科學手段，在考古學前面加一個限定名

詞，比如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土壤考古學、金屬考古學等等。這些加以限定詞的考古學，都是用自然科學手段來做研究的，可以簡稱為科學考古學。

科學考古學與狹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完全一致的。目前在國外，各種科學考古學已經具備比較成熟的技術，取得很多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從不同側面豐富了我們對於古代人類生活的認識，加深了我們對於古代文化發展變化原因的理解。科學考古學的出現，豐富了我們關於什麼是考古學的答案。

第二個兩分法，是將考古學分為史前的和有史時代的。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活動的歷史。研究人類歷史可以有多种途徑，但是考古學的獨特貢獻是其他學科所不能比擬的⁴⁴。考古學對歷史研究的貢獻，在史前和有史時代是有所區別的。

史前時代考古學，提供並研究文字產生之前人類歷史的資料；換言之，史前人類歷史的全部資料，都是由考古學產生的。我這裡所說的，當然指廣義的考古學。所以，史前考古學便等於史前歷史學，史前考古學者便等於史前歷史學者。

有史時代的考古學，則提供新的歷史資料。除了考古學之外，我還想不出有什麼其他方法能夠得到新的歷史資料。當然也許有個別情況，比如中國古代的某本典籍，在國內失傳而在國外又重新發現。不過這畢竟是極少、極偶然的事情。有史時代的考古學提供新的資料並對新、舊資料加以研究，當然也屬於歷史學的範疇。

照剛才所說的，這樣兩種兩分法不會是百分之百的嚴密，

但是是符合一般的實際情況的。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對考古學定義的討論，做三點總結：

- 1，考古學從實質上說就是歷史學；但是它有獨特的對象和獨特的技術、方法，是一種獨特的歷史學。
- 2，考古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是富於變化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它要與許多其他學科做點上或面上的接觸。
- 3，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訓練，也應是有靈活性的，多樣性的；所受的訓練範圍越廣，工作的範圍就越大，對歷史研究的貢獻也就越大。¹³

這篇文章是長了一點，不宜上課使用，但發下之時，不妨提醒學生，文字雖多，但寫得很清楚，可以讓我們對於考古學是什麼，有一個完整、正確而且十分清楚的了解。學生讀的時候，要他們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如果這段文字可以分成兩個段落，從哪裡分開最為適宜？學生應該很容易找到「我們一向如此，不能算是合理的回答。」這句話分開了前後兩個部分，前半談考古學包括那些內容，後半談這些內容應作怎樣的分類。二是，張光直說，考古學就是歷史學，但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學，我們怎麼解釋為好？如果學生說，歷史學是研究人類過去活動的學問，考古學是研究遠古時期，也就是史前時期人類的活動，當然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學，就是不錯的回答了。

第二位，我選徐旭生。上文述及徐旭生對顧頡剛的「層累造成古史說」十分不滿，認為不能成立，就是從方法上加以解析的結果。徐先生有一篇文章，〈我們怎麼來治傳說時代的歷史〉，專談方法。不過，這篇文章對中學生來說，長了一點，也難了一

¹³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頁53-57。

點，要學生自己去讀，學生不只讀不懂，也很難讀得完。老師帶著讀，一來沒這麼多時間；二來效果也不會好。由於這類文章很少，不讀很可惜，我們不妨只讀一點，嘗嘗閱讀史學方法文章的味道。我選文章中談「綜合材料」與「未經系統化的材料」這兩種材料如何運用的問題，看看徐先生是怎麼談的。

綜合材料比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價值低。現在所保存的關於此時代的文獻方面的史料，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專篇的、成系統的，大家看過可以得到一個綜括印象的；二為零星散見的，不成系統，有時不靠前項資料就很難知道把它向那裡安插的。前一項有《尚書》的頭三篇：〈堯典〉、〈皋陶謨〉、〈禹貢〉；《大戴禮記》兩篇：〈五帝德〉、〈帝系〉；《史記》頭三篇：〈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此篇後半所記已進入狹義歷史時代，不在本研究範圍內）；《漢書·律歷志》末所載的劉歆諸人的〈世經〉等。後一項除金文中保存了兩三條，極可寶貴外，以見於《左傳》及《國語》二書的為最多。先秦及兩漢諸子中也還零零星記載一些（以上所說暫以兩漢以前材料為限）。後一項資料離開前一項資料幾乎無法整理，所以從前的人不很看得起它。前一項的《尚書》頭三篇，因為從前的人總是相信《尚書》是孔子手定的，所以權威最高。……

本來當春秋時代齊桓、晉文以後，我國的文化有很重大的進展，當日的賢士大夫對於古老口耳相傳的傳說多所稱述。遲之又久，就有人想把這些散漫的傳說搜集起來，以便將來人的誦讀紬繹。可是他們那個時代離古代已遠，從前各部族間的分別已經很模糊，工作人已經相信當日中國

人的同出一元，他們就用這樣的精神去整理材料。原本是來自複雜的材料，現在用單純的方法去整理，我們不難想像在他們工作的時候要有些幾乎無從克服的困難。他們是最早的歷史工作人，既沒有失敗的經驗，又不像近世的工作人有很豐富的落後部族的材料來作比較。他們在來自多元的材料中間總會看出來有不少不容易逗頭的地方，可是他們並不懷疑這些材料本來無從逗頭，卻來大膽地用主觀的看法，損益增刪，以使它們可以逗頭。這樣，多經過一次手，就多經過一次的損益增刪，就更進一步地失真，並且這一次是很重要的失真，遠不像後一項零金碎玉，為當日賢士大夫隨便的稱引，本無容心，就是失真，也很寡少。後一項還沒有綜合，還沒有系統化的史料，極可寶貴的點正在此處。所以我們現在應該一改以前用經書判決一切的辦法，對於已經系統化的材料必須特別慎重。把後一項零星散漫的史料小心地搜集和整理起來，洗刷掉它那神話的外殼，找出來可信的歷史核心。綜合材料雖說比較失真，但是它們的寫定，主要還是在先秦，屬於相當的早期。它們的工作人也是搜集了不少古代的材料，並不是憑空臆造，看《堯典》中「命羲和」條下文字有甲骨文或《山海經》的不同來源的史料同它適合，就可以證明。所以較古的綜合材料只要它同後一項未系統化的材料沒有衝突，也還不損失它那可寶貴的價值。這樣翻轉從前的辦法，近數十年來的歷史工作人大致也在使用，不過對於這兩項的分辨和它們的性質，似乎還沒有人加以詳盡的說

明，所以我又把它提出來，並且加以說明。¹⁴

這篇資料談的是研究方法。我們知道，研究歷史沒有固定的方法，方法是跟著題目走，問題不同，方法因之而異。我們想要知道歷史學家採用的方法，大多是從他寫成的歷史論著中，去探尋、分析，藉以能夠有所了解。有時著者偶爾留下一點撰述時的想法或思考，就成了我們十分重視的線索，也是我們能夠真切理解的依據。我們很希望能夠讀到歷史學家針對某一問題，從方法上加以說明：前人的不妥之處何在，我如此著手的理由是什麼。這類文字不是沒有，卻十分有限，彌足珍貴。我們不能讀徐旭生的〈我們怎麼來治傳說時代的歷史〉全文，就選取其中的兩小段來讀讀，也可以略知歷史研究方法中某些基本概念了。

歷史是根據前人留下的資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因之，資料的性質十分重要，歷史學家在使用之時，要有相當清楚的認識。徐旭生把研究傳說時代的資料，分成「綜合材料」，即經過整理、成系統的、專篇的資料，與「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兩類。也說明了兩者之間的大致關係，即：「（後項）有時不靠前項資料就很難知道把它向那裡安插的」「後一項資料離開了前一項資料幾乎無法整理」。但是，對於今天我們來說，前一項資料顯然已經「失真」，價值不如後一項資料了。

「失真」的原因是資料經過後人的整理，多經過一次整理，便進一步失真，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系統化的材料極可寶貴」的原因。但是，這並不表示經過整理的、有系統的、成專篇的資料沒價值或不重要。相反的，這種資料代表文化上的重大進展，也是整理者在甚為艱困情境下的重大成就。

¹⁴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頁 32-33、34-35。

這時的整理者，就是「最早的歷史工作人」，他們在怎樣的情境中，從事歷史的工作呢？依據文中的前後次序，應是：一、他們沒有失敗的經驗；二、他們沒有可資比較的材料；三、他們要盡量把無法逗起來的材料，用主觀的看法，逗合起來。四、他們搜集了不少古代的材料，不是憑空臆造。由於他們的時期主要在先秦，尚屬早期，所以，這些資料只要不與未系統化的材料矛盾衝突，仍有其寶貴的價值。我們可以說，盡量收集有關的材料，不可憑空臆造，再把這些材料盡量逗合起來，不就是歷史學家工作的主體嗎？早期的工作者，既無可資比較的材料，又乏失敗的經驗教訓，難免不用大膽的主觀看法來完成任務，即使有失真之處，也只能說是時代的限制，絕非有意的作偽造假。

這段資料難讀嗎？這裡沒有歷史上常見的英雄氣概、智者謀略，更沒有纏綿悱惻的宮闈密聞或腥風血雨的戰場景象，怎麼不難讀呢？但是，過去世界裡秀異人物的傑出表現，社會大眾的生活心態，時代變遷的喜怒哀樂等等，我們是怎麼知悉的呢？不是靠歷史家的工作嗎？而歷史家如何著手他的工作，何妨從了解「最早的工作人」開始呢？這樣想來，這段資料就會覺得分外重要，高中學生應該有所理解才好。

伍、小結

學生進入中學校門，已經不再是備受父母、老師呵護，天真可愛的孩子；中學生必須感到作為學生的責任，應該認真學習一些終身受用的知識。歷史是一門理解過去世界的知識，它可以提供許許多多昔日的經驗、人世的道理，幫助我們認識今天，甚至展望未來。告訴我們過去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應該知道哪些

重要內容的人，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我們歷史知識的來源，是我們必須有所認識的。

歷史學家幾乎無不學識淵博，主要來自大量閱讀，而且從年紀不大時即已開始。我們知道，閱讀是學習的基礎，學生若不閱讀，什麼科目都學不好，文、史尤然。我們看到這些傑出的歷史學家，從早期的閱讀，發現自己的性向所好，繼續努力，終能展現才能，有所成就。這些內容，總是可以給予我們青少年學生一些提醒或啟示。再說，老師在課堂發下屬於「課外」的閱讀資料，除了是知識上的必要訓練之外，多少也是對於學生閱讀的支持與鼓勵。學期之中，學生課業繁重，閱讀時間有限，老師不妨精挑細選，從傑出歷史學家的論著中，摘錄最為精要的文字，提供學生閱讀。這時，略述其中的要點，並設計一些簡單的作業，都是需要的動作。

閱讀絕不是把文字從眼底滑過而已，閱讀的重點在於思考，這是需要學習的。我們從精選的資料中，一方面看到前人如何閱讀，從中得到啟發；另一方面則著手加以練習，說出它的要旨，理解它的論析，領悟它的精義。儘管我們沒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像國文課那樣仔細商討，但也相信，學生只要略加點撥，就能啟動聰明，他們只要掌握關鍵，即可舉一反三，得到學習的成效。

我們常說，要培養學生的能力，而且是「帶得走的能力」。給學生很多的知識內容，要學生記得，有其一定的意義，不是一無是處，欠缺的就是這種能力的培養。給學生閱讀的資料，帶領他們讀懂資料中的意含，引發他們進一步閱讀的興趣，讓他們嚐到知識的美妙滋味，激起他們自我學習的動機，這門學科的「能力」就自然而然地依附在他們的身上，隨著行走天涯。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劉世珣）